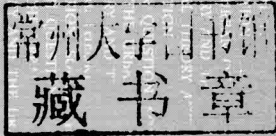


社会理论与城市问题

Social Theory and the Urban Question [英] 彼得·桑德斯 著 郭秋来 译



凤凰文库
城市研究系列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Phoenix Education Publishing, Ltd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理论与城市问题 / (英)彼得·桑德斯著;郭秋来译. —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2018.4
(凤凰文库·城市研究系列)
ISBN 978-7-5499-7218-0

I. ①社… II. ①彼…②郭… III. ①城市社会学—研究 IV. ①C91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75093 号

Social Theory and the Urban Question, by Peter Saunders, published by Routledge.
Copyright © 1986 by Peter Saunders.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right © 2018 by JSEPH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10-2015-441 号

书 名 社会理论与城市问题
著 者 [英] 彼得·桑德斯
译 者 郭秋来
责任编辑 任 晖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苏教网址 <http://www.1088.com.cn>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电话 025-57572508)
厂 址 南京市六合区冶山镇(邮编 211523)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22.75
版 次 2018年5月第1版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99-7218-0
定 价 48.00元
网店地址 <http://jsfhjycbs.tmall.com>
公 众 号 苏教服务(微信号:jsfhjyfw)
邮购电话 025-85406265, 025-85400774, 短信 025-85420909
盗版举报 025-83658579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

出版说明

城市研究领域很深广，涉及多学科内容。经济、政治、文化、环境、资源、规划、可持续发展等主题，都与城市有关。这些主题大致涵盖了实体的物质空间和抽象的文化空间，也许在一定程度上与当代生活有关的问题大多是城市问题。

“城市研究系列”即是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可能遭遇的各种问题在理论上的一种回应。“系列”以经典性与前沿性为导向，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并重。在内容方面重点关注与城市主题有关的经典性著作、各学术流派的代表作、当代前沿问题研究、城市研究新理论、城市文化现象与发展方向的探讨等。这些内容不仅追溯了城市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诸多富有影响力的节点，也契合了当前社会的热点和趋势。

“城市研究系列”既重视国外先进的城市研究著作的引入，也重视国内城市研究领域中的优秀的原创著作的出版。我国的城市研究起步较晚，引入国外先进的学术理论，其目的是丰富我们认识城市的路径，建立更加科学的观照体系，从而形成并完善我们本土的城市理论系统建构。

作为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目击者、参与者、解释者、引领者，我们有

责任告诉世界这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在这一巨大的城市化转型中所发生的一切。而城市本身所具有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也值得我们去探究,去呈现,去引领。

我们期待“城市研究系列”这一高水准的中外城市理论研究出版平台所带来的新角度和新方法,所开启的新视野,所探讨的新问题,能为我国新型的城市化进程提供充分的学术支持。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第二版序言

1970年,大学本科的最后一年,我选择了城市社会学。对于前路我知之甚少,而事实也证明这门学科的确十分庞杂:这一周还在考察西非城镇的志愿组织,下一周又跑去研究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权力结构;贝斯纳尔格林区的大家族、阿尔·卡彭时期芝加哥的舞厅,也在争夺着我们的注意力;古代城市、中世纪城市、现代城市,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都被我们纳入学术视野。事情很快就清楚了,城市社会学关乎一切——凡是能在城市里看到的事情,你都可以在城市社会学的著作中找到。

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在我们所知的学者里,没有一个人清楚地知道城市是什么。显然,城市是大量人口居住和工作的地方,但即使如此基本的定义也经不起推敲。同样规模的聚居地,在英国也许只会被称为小镇、郊区甚至村庄,但在北美和澳洲却是货真价实的城市。那么一个聚居地到底要多大才能成为一个城市呢?

对这个问题的反思,立即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市与乡村、城里与乡下的界线,通常是模糊的。我们不仅生活在一个

大都市的时代——城市“联合起来”大肆扩张，突破了原有的空间阻隔；我们还生活在一个需要从远郊到市中心通勤的时代，一个不管住在哪里，都得上同样的学校、买同样的商品、收看同样的电视节目、给同样的政党投票、过着同样的生活的时代。像英国这样的社会，城里能见到的事情，城外大多也能见到。这使得我们几乎不可能区分出任何与城市生活不同的社会生活，更谈不上把城市看成一个变量，并用它去解释一些特殊的社会现象的产生了。

我进入城市社会学之后的数年间，这门学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城市”和“乡村”这两种对立的生活方式的考察与解释，如今都被认为是无用功。还有一些想要尝试探究城市特定空间形态下的特定社会进程，但在我看来，这条路也没能走通。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本书的第一版完成以前，城市社会学已经发展到了一个临界点——将西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一些特定的社会进程视为城市现象，这样做看上去既无可能，也无价值。“城市生活”无处不在，而有关城市的社会学也无所不包。

一旦接受了这个结论，这门学科也许就离消失不远了，而继续为这样一门毫无独创性的学科开课、研究、写书，都是没有意义的。但实际上，城市社会学与城市研究都在继续着。不仅如此，这门学科甚至可以说是当代社会科学里最令人振奋和生机勃勃的领域之一。对于这个显而易见的悖论，我的解释是，在寻找特定“城市”社会现象的漫长历程中，城市研究偶然发现了一个与众不同又至关重要的研究议题。这个议题跟城市关系不大（如果不是一点关系也没有的话），但跟当代社会组织最紧迫的问题息息相关。简而言之，城市社会学成了一门消费社会学。

本书的第一版写于 1979—1980 年，出版于 1981 年。在第一版的最后一章，我概述了这门消费社会学可能包括的内容。虽然稍微超出了概念框架的范畴，但我的概述正是对这个新兴研究范式的初步描绘。此后数年世殊事异，但这些变化和发展推动了我对这本书的修订与再版。

最主要的变化，当属西方社会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政治经济状况

的戏剧性转变,英国自然也在其中。经济衰退加剧,官方记录的失业率达到了此前最高纪录的三倍,传统产业土崩瓦解。这一切都跟“激进右派”的保守党政府在1979年和1983年的连续当选暗合。这个政府通过削减福利支出、服务私有化、建立市场意识形态来重组整个消费的政策基础,与此前的社团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正好对立。英国社会明显的两极分化也与之相合:南部和北部、城区和郊区、黑人和白人、失业者和就业者,多方面的分化带来的愤怒与失望之情,毫无疑问地成了1981年伦敦、利物浦等大城市爆发的街头骚乱以及1985年伯明翰的汉兹沃斯和伦敦托特纳姆发生打砸抢烧事件的重要原因。

这些社会变化,必然意味着本书第一版里的一些内容(例如对社团主义的关注)至少应得到重新审视,而另一些没有谈及的问题(例如消费的私人化)则需要加以突出。社会研究必须与时俱进,这个新版即旨在探寻一个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社会变化相应的新议题。

第二个变化是本书第一版发行之后城市研究自身的变化。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在过去数年间的支配地位已不复存在,尤其是领军人物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的一本推翻了他于20世纪70年代花了大力气去建立的大部分哲学、理论、政治观点的书出版以后。这本书与大卫·哈维(David Harvey)、雷·帕尔(Ray Pahl)、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多琳·马西(Doreen Massey)等学者的著作一起,通过引入实质性的新问题并开启理论与方法上的新视角,完成了城市研究议题的整体转变。回想起来,本书的第一版发行之时,正是城市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关键时期,旧的范式初露颓势,而新的则尚待成熟。在本书的第二版里,我会超越对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简单批判(实际上第一版即止步于此),去寻找理论研究潜在的激动人心的新方向。

如前所述,在这些“新方向”中,最为重要的是对于消费的社会学探索。邓利维(Dunleavy)(关于消费分化)和帕尔(关于家庭自我供给)等人的著作对于这一新议题的建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此外,我还在第一版的概念

性框架上填充了一些实证和理论依据,这在第八章中可以看到。

总的来说,本书经过了一次根本的、彻底的修订。第七章、第八章以及第六章的主要部分都是全新的,与原版相差甚远,而前五章也有或多或少的修改,附录也加长了。

第一章考察了韦伯、涂尔干、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历史研究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分析中对城市问题的论述。这一章还概述了他们在解释社会时方法论上的区别,可以说正是这些方法论,构成了后面章节将要谈到的众多理论和方法的基础。我对这一章的修订,主要是简化了对马克思的讨论,此外还修改了关于韦伯艰深而重要的城市研究的讨论。

接下来的五章,包括了本世纪的学者们寻找现代城市独特的社会学进程的四条主要路径。第二章讨论了从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到阿莫斯·霍利(Amos Hawley)的人类生态学理论,其余部分基本与第一版一致。在第三章里,我考察了城市主义的众多文化理论,特别注意了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和路易斯·沃思(Louis Wirth)的理论,而在这一版里我也尽可能注意到了声名远播但缺少读者的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接下来是第四章关于约翰·雷克斯(John Rex)和雷·帕尔的韦伯式城市社会学的论述,而随着英国 1979 年以后社会状况的改变,对于管理主义和社团主义理论的论述也进行了大篇幅的修改。

第五章和第六章讨论了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研究。第五章比较了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和曼纽尔·卡斯特尔方法上的巨大差异,在参考了新的研究列斐伏尔的二手文献以及卡斯特尔观点的变化之后,对这一部分做出了较大的修改。卡斯特尔近年来方法上的转变促使我重写了第六章,重写的部分不仅追溯了这一转变,也尝试着对他这些年来的方法和理论做一个总结。

我重写了第七章和第八章。在总结了前面章节的观点以后,第七章考察了两类文献,它们在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或工业社会时,试图对

空间的社会意义建立理论。第一类与苏贾(Soja)、哈维、马西等学者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相关,主要探讨了空间对未来资本积累的重要建构作用。另一类则更多与约翰·厄里(John Urry)和吉登斯等社会学家相关,致力于寻找空间对于建构社会关系的重要作用,而这一作用表现为促进或限制社会进程。这一章的结论是:虽然空间是所有社会联系的一个重要的固有特征,但它本身并不足以成为理论分析的对象。

这一结论也为最后一章做好了铺垫。这一章探讨的是城市社会学如何从对城市、地区等空间单元的关注之中剥离出来,进入对消费问题的实质关注。本章的一开始,我分析了国家消费配置的政治,概述了所谓的“二元政治论”,并反驳了针对它的一些批评。然后分析了目前消费模式从社会化向私有化的转变所造成的影响,并提出在相对稳定的多数人口和日渐增多的边缘少数人口之间正在出现一个重要的社会分化。最后探讨了这种分化如何消除,以及消费配置如何重组,以便人们能够加强对日常生活的重要领域的掌控。

在修订这本书的时候,我常常觉得还不如从头到尾重写一遍。我似乎陷入了大卫·哈维所描述的那种当代资本主义的困境。按他的说法,资本主义企业很难使现存的资本模式适应新的要求,而我也常常苦于如何在那个数年前就搭好的分析框架中组织新材料,表达新观点。不过最终问世的仍然是一本旧书的新版,而非一本全新的著作,新旧两版之间还是存在两个最基本的联系。

第一个联系就是贯穿全书各章节的核心主题。我在第一版中就已提出,并在这一版中更加坚定不移地反复强调:由于城市社会学对消费问题实质性的、眼光独到的关注,它还具有尚未被广泛意识到的巨大潜力。而之所以尚未引起广泛重视,是因为“城市社会理论一定要与城市和空间联系在一起”这一观念始终挥之不去,成为了一个障碍。我在1981年就提出并且至今仍然认为(尽管受到无数批评),那种只把城市社会学或者城市研究局限于空间层面(诸如城市、地区、社会-空间关系等)

的传统，既徒劳无功，又离题万里。和社会科学的其他门类一样，城市社会学也会为空间找到特性，就像它为时间找到的特性那样，但这既不能也绝不会成为这门学科的核心。把城市社会学视为消费社会学，它就能触及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核心，比如当前英国的社会组织问题；而如果把它看作空间的社会学，这些问题都与之无关了。

新版与旧版的第二个联系是仍然保持了一种写作意图：一本关于理论的理论著作。在后面的章节中，我希望不仅能对当前城市研究的思考和讨论有所助益，也对 19 世纪至今的城市社会理论传统有所反思。我相信，一本“教科书”不必拘泥于枯燥乏味、死气沉沉的理论罗列，因为当它以同情之心描绘着各个流派之时，也必定会被卷入这些批判论争之中。因此，对于我心中那个既令人着迷又极具潜在重要性的理论研究传统而言，这本书既是一个纲要，也是一次介入。

在第一版中，我曾向那些以各种方式为本书的写作提供过帮助的朋友和同事们致谢，在此我很乐意再次向 Jenny Backwell、Colin Bell、Alan Cawson、John Lloyd、雷·帕尔和安德鲁·塞耶(Andrew Sayer)表示感谢。而在两次出版之间的这些年里，我在学术上又收获了更多的帮助，这些帮助不只来自萨塞克斯大学令人奋进的城市与区域研究小组的同事们，也来自英国、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众多学者，与他们的讨论和交流使我受益良多。

通常情况下，还要感谢那位费尽心力的打字员，不过这次就不用了，因为这本书是我自己在家用电脑上打出来的(这或许可以作为我在第八章提到的自我供给和私有化消费的一个例子)。但我还是要感谢 Claire 和 Michael 对于我霸占电脑的宽容忍让，我害他们玩不了 Beach-head 和 The Staff of Karnath 游戏。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这本书献给他们。

1985 年 9 月，于布莱顿

| 目录

第二版序言	1
第一章 社会理论、资本主义与城市问题	1
马克思与恩格斯:城镇、乡村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4
马克斯·韦伯:城市与理性发展	15
埃米尔·涂尔干:城市、劳动分工与团结的道德基础	25
第二章 作为生态共同体的城市	38
社区与社会	39
人类生态学已死.....	51
.....人类生态学不朽!	56
第三章 作为文化形态的城市	68
大都市与精神生活	72
都市与乡村生活方式	81
“正确的,但没那么重要”	87
第四章 作为社会空间系统的城市	97
空间结构与社会结构	98
城市管理者:自变量、因变量还是中介变量?	105
住房分配与阶级斗争	121
第五章 作为意识形态的城市	133
亨利·列斐伏尔:城市的人道主义批判	135

曼纽尔·卡斯特尔：科学、意识形态与城市问题	144
认识论帝国主义与新城市社会学	155
第六章 作为集体消费空间单元的城市	164
城市系统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165
城市政治与集体消费危机	170
生产、消费与城市	184
第七章 一种非空间的城市社会学？	217
超越城市社会学	219
经济组织的空间维度	229
社会组织空间维度	250
第八章 从城市社会理论到消费社会学	264
社会化消费的政治	266
消费分化与社会重新分层	285
私有化消费、自我供给与二元社会	305
附录 关于理论的实证检验	324
参考文献	335

第一章

社会理论、资本主义与城市问题

如今社会学的大多数领域,在理论和方法上都比较多元化,城市社会学也不例外,因此才有了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韦伯主义城市社会学等各式各样的流派,它们讨论的问题不同,采用的标准在充分性和有效性上也不相同。而城市社会学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各门各派都很少关注这个学科的所谓“开山鼻祖”们真正为城市问题写过些什么。例如当代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学理论,在相当程度上参考了马克思关于辩证唯物主义方法、阶级斗争与资本主义国家理论等问题的论述,却很少关注他对城乡分化、城市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等问题的探讨。同样,韦伯主义城市社会学也常常对韦伯关于城市的文章视而不见,反而把注意力集中在他的官僚制和社会阶层研究。社会学的其他分支,大多直接从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欧洲社会理论家关注的实质问题中发展出来(例如工业社会学的异化与失范、组织社会学的官僚制、政治社会学的国家政权、宗教社会学的世俗化,以及知识社会学的意识形态问题),唯独城市社会学却一如既往地轻视这些思想家关于城市问题的

著作，反而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兴起于芝加哥大学的人类生态学理论视为这门学科的起点。

其中的缘由不难发现。并不是因为马克思、韦伯、涂尔干这些社会学大师很少谈到城市——恰恰相反，正如尼斯比特(Nisbet, 1966)所说，在某种程度上，城市问题正是他们的重要主题之一——而是因为他们的著作正好表明一种独一无二的城市社会学，绝不可能诞生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环境之中。

这些社会学家写作之时，关注的焦点都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为那个时代带来的社会、经济、政治影响。当时城市的高速发展伴随着或隐或显的破坏性社会变迁。以英格兰和威尔士为例，“城市人口”(官方数字)在19世纪下半叶几乎翻了三倍。到了世纪之交，超过2500万人居住在“城市”，占总人口的77%(见 Hall *et al*, 1973, p.61)。如此的剧增已经足够令人震惊，但在许多政治家与评论家眼中，随之而来的是“城市”问题的凸显——贫穷与疾病的蔓延、法律与秩序的崩溃、婴儿死亡率的上升，以及各种光怪陆离的社会乱象——这一切也引发了他们对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的强烈批评和恐慌。

这些社会变迁的巨大程度和重要程度，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当然都一清二楚，但是他们的著作中都明确显示没有一个人觉得有必要专门发展一套城市理论去解释这一切。也就是说，他们三个似乎都同意如下观点：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城市问题应该被纳入整个社会运行的更广泛的分析范畴之中。虽然城市可以为社会变迁的基本过程提供一个生动的图示，诸如道德凝聚力的解体(涂尔干)、计算理性的发展(韦伯)，或者资本主义生产释放出的破坏力(马克思)，但城市本身却无法解释这一切。对于这三位来说，他们需要的理论并非关于城市，而是关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引起的社会关系基础的变化。而他们所完成的任务正是后者。

他们在讨论城市时，有两种语境。首先，他们三位都把城市视为西

欧社会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这一历史语境下重要的分析对象。例如,韦伯在关于城市的文章中,展示了中世纪的城镇对打破封建政治与经济联系并建立新的理性精神起到了多么重要的作用,而这种理性精神对资本主义的企业家精神和公民社会的民主权利又是何等重要。与之相似,涂尔干展示了中世纪的城镇如何加速传统道德的瓦解,促进社会分工的形成,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把中世纪的城乡分化视为这一时期新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传统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对立表现。不过,他们三位显然都认为,城市只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显得重要,无论是古代城市,还是现代资本主义城市,都不能纳入这个分析范畴之内。现代资本主义城市已经不再是人类联系的基础(韦伯)、社会分工的场所(涂尔干)、特定生产方式的展现(马克思),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既不合适,也不会有什么成果。

第二种语境,是考察城市对资本主义社会基本进程的次级影响。换句话说,城市并不是某种社会发展的起因,而是一个重要的条件。最明显的例子来自马克思和恩格斯。现代无产阶级是一个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与资产阶级相对立的有组织的阶级,虽然城市自身并不能创造他们,但却是他们自我实现的重要条件。这是因为城市集中了劳动阶层,令他们与资本家的对立暴露无遗。而涂尔干在讨论高级社会分工与现代社会道德凝聚力的问题时,也把城市化视为社会功能分化的重要前提。因此,在这两个例子中,理论的发展(阶级斗争与新型社会团结)都来自于城市的发展。

现在我们可以理解城市社会学为何会轻视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的城市学说了,因为在他们那里,当时的资本主义城市自身显然并不足以建构一个具有理论意义的学科;因此也就无怪后世的学者绕过他们的城市学说,反而从他们思想中的其他方面来建立城市社会学了。例如,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看到涂尔干劳动分工的社会效应理论如何在 20 世纪 20 年代被纳入城市发展与分化的生态学理论之中,韦伯的政治统

治与社会分层理论如何在 20 世纪 60 年代成为“城市作为资源配置的系统”这一概念的基础,以及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与阶级斗争理论如何在 20 世纪 70 年代发展为新的城市政治经济学的基石。这三位社会学家对后来的城市社会学的影响无处不在,但也是被后人精心选择过的。

本章旨在回顾韦伯、涂尔干、马克思与恩格斯是如何得出如下结论的:当时的资本主义城市无法成为一个具有理论意义的分析对象。他们的分析路径各不相同,但结论却完全一致。也就是说,虽然他们的方法、理论和政治信念大相径庭,但最终的结论却大同小异。因此,在每一个案例里,我们都要首先考察方法论,再考察在这一方法论的指导下有关城市问题的研究成果。

马克思与恩格斯:城镇、乡村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马克思的分析方法,在后世引起了漫长而激烈的争论。马克思自己当然深信这是一种“科学”方法,因为他用这种方法发现了社会发展的动力,就像达尔文发现了自然界发展的动力一样。但问题在于,马克思对其方法的阐述并不详尽,所以这些科学的发现是如何被完成的,就需要后来的哲学家和理论家们来具体讨论了。

虽然马克思从未使用“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术语,但他的学说经常被贴上这个标签。这个词准确地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的两个基本原则。

辩证法的本质就是任何“整体”都由相互对立的部分组成,想要理解事物的任何一方面,都必须联系其所处的背景。例如,如果我们不能理解资本家财富和权力增长的过程,就无法理解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工的困境,因为资本家和劳工是一对在本质上必然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关系。因此,在辩证法中,就不能在不考虑整体社会联系的情况下单独分析事物的任何一个方面。换句话说,只有在对整体的分析中,才能完成